

刘湛恩与非战建设运动

章华明

(同济大学档案馆, 上海 200092)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政局动荡,日军侵略日盛。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刘湛恩参与组织非战建设运动,倡议各界领袖订立“国民非战公约”,成立“非战运动大同盟”。虽然运动最后无疾而终,但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国民,推广了团结抗日的思想,有助于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关键词: 刘湛恩; 非战建设运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G 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3)03-0259-05

Herman C. E. Liu and Non-War Construction Movement

Zhang Huaming

(The Archiv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turbulent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was underway. As one of the main initiators, Herman C. E. Liu organiz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non-war construction movement. He proposed that leaders in all social circles should sign a “national non-war pact” and set up a “non-war movement alliance”. Although the movement was finally unsuccessful, the nationals were awakened in to some extent and the idea of defeating Japanese through the uniting was wide spread. This contributed to the future formation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he final victory in the anti-Japanesewar.

Key words: Herman C. E. Liu; non-war construction movement;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ed front

刘湛恩(Herman C. E. Liu, 1896—1938),湖北阳新人。191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留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除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等担任过教职外,刘湛恩还在基督教全国青年会从事职业教育、公民教育运动,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928年,刘湛恩任上海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声名远播。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救亡运动,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之一。1938年4月7日,因拒绝担任汪伪政府教育部长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①被暗杀。1985年

被迫认为革命烈士,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早在大学时代,刘湛恩就表现出杰出的组织和演讲才华,甚至获得东吴大学的演讲冠军,这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和宣传抗日救国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出身于宗教世家、基督徒、留美博士的经历,则使得刘湛恩在上海这个中外交流的重镇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很快成为沟通中西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热爱祖国,崇尚和平,并身体力行,成为20世纪30年代

^① 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梅龙镇广场处。

收稿日期: 2012-09-03

基金项目: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1XSZ01)

作者简介: 章华明(1967-),男,研究馆员。研究方向: 档案学、高等教育史。E-mail: baiyanghe@tongji.edu.cn

“非战建设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虽然运动颇多书生意气,最后也无疾而终,但客观上却体现了刘湛恩及以他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难能可贵的实践精神,实际上也为刘湛恩后来成为上海抗日救国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埋下了伏笔,值得肯定和研究。

一、前戏:20世纪20年代的和平运动

刘湛恩热爱祖国,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经成为留学生们的榜样。他的博士论文着眼于心理学和中国公民教育的结合,题目为“非语言智力测验在中国的应用”。刘湛恩还先后编写了《公民教育运动计划》、《国庆节与公民教育运动》、《公民宣讲队办法》、《公民与民治讨论大纲》、《全国青年会公民教育运动报告》、《公民与民治》、《公民诗歌》、《怎样做中华民国的良好公民》等著作,成为公民教育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有感于国内政局动荡,战争此起彼伏,在大力推进公民教育运动的同时,刘湛恩还致力于和平运动。1923年6月,直系首领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全国掀起反直高潮。各派反直势力齐集杭州、上海,浙、沪一带俨然成了反直中心。于是直系军阀齐燮元联合福建孙传芳,准备夹击上海和浙江。此时,江浙资产阶级以“力图保全两省治安为宗旨”,组织“江浙和平协会筹备会”,联络皖、赣、闽各省人士开展和平运动,得到了东南各省资产阶级的支持。1923年8月,和平协会正式成立。该会以和平弭兵为宗旨,以阻止直系军阀进攻上海、浙江为主要目的。协会成立后,即派代表分别与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和齐燮元会谈,要求保持东南地区和平。8月19日,《江浙和平公约》签订,延缓了战争爆发。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刘湛恩和黄炎培、褚辅成、方椒伯、穆藕初^②等参与其事,受到各方好评。

但好景不长,战乱如旧,刘湛恩对和平运动的热情亦未减弱。为保障运动的有序进行,1926年,刘湛恩与陈伯华、孙祖基^③三人合作编写了《和平运动》^④,试图有条理地、稳步推进和平运动。刘湛恩在《大纲》前写有这样一首诗:

中国是中国人所共有的。
中国的和平运动,
人民自己不来鼓吹、实行,
等谁来鼓吹实行呢?

序言为余日章^⑤所作。或许是对运动本身不抱多大希望,该序言对运动的前景只字未提,大部分文字都在强调内乱的原因及其危害,说“弱国无外交,余则曰,内乱之国无外交。进言之,内乱者,弱国之源也”。余日章还坦言,“吾人果愿划除内乱,而使全国返于和平,不可不付相当之代价。”^⑥

事实也正如余日章所料。先有宁汉分裂,后有宁汉合流,再有反蒋派先后在北平、广州组建政权机构,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而国共两党军队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正酣,偌大的中国无时不处在战争的阴影中。而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峙”则形成了自1927年宁汉分裂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蒋局面。曹孚^⑦曾指出,宁粤代表在沪磋商和平统一问题之际,曾经达成共识:“嗣后国内战争,宜由全体中委几分之几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员几分之几以上之决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之,不得擅诉之武力,又同意设立一全国财政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占其多数,以监督全国之财政,其于用兵费用,不准支取。”^⑧历史事实证明,这种思想非常天真,严重脱离实际。1931年7月,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宣称“攘外必先

② 褚辅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秀水县(今嘉兴)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近代爱国人士。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主张抗日。1946年5月,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时,任中央理事。后曾任上海法学院院长。方椒伯(1885—1968),浙江镇海人,名积蕃,字椒伯,民国时期上海大律师、实业家。先后担任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董事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等职。穆藕初(1876—1943),民国时期著名的棉花专家,上海工商界名流,昆剧票友,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者之一。

③ 孙祖基,江苏无锡人,曾就读于江苏第二师范学校。著作还有《怎样做公民》、《地方自治讨论大纲》等。

④ 出自1926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书局发行的《和平运动》,现上海图书馆有藏。

⑤ 余日宣,湖北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著名基督教人士余日章之弟。文华大学文学学士,曾赴美留学。归国后,历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北京清华学校政治学系主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中校秘书等职。曾任沪江大学政治与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1951年2月,沪江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后,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沪江大学停办后到复旦大学任教授。

⑥ 出自1926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书局发行的《和平运动》,现上海图书馆有藏。

⑦ 曹孚(1911—1968),上海宝山罗店人,字元怀。麦伦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进复旦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八一三”事变后,随校入川。1947年,赴美科罗拉多大学深造,两年后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应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专讲美国教育史。建国后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1954年,曹孚调往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曾参与我国教育科学规划的制订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建。

⑧ 《废止内战运动文电汇刊》中曹孚文:“国内和平方案——读刘湛恩博士(和平建设运动)后”。

安内”，坚持内战政策。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坚决实行抗日和反蒋方针。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为统一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已难在全国推行其政令、军令。就这样，中国在内乱、内战和外敌入侵中又迎来了“一·二八”事变。

二、刘湛恩：非战建设运动主要发起与组织者之一

“一·二八”事变中仍然不乏和平倡议者。“英伦某女教士曾提议组织国际和平军，愿置身于中日两军火线之间，宁以血肉之躯，喂之炮火，以促成双方之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事变后，国民政府试图迁都洛阳，四届二中及国难会议^⑨也相继举行，但都于国事无补。等到《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国人痛感屈辱，纷纷追求国难发生之原因，认为军阀不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要救国难，当先废止内战。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西方教育，在执掌沪江大学初期，刘湛恩曾一度主张“不消极！不破坏”，但实际上沪江大学本身却无法置身于中日冲突之外。“九一八”事变后，沪江学生不但像其他学校一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一度还成为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当“一·二八”炮火震撼上海、殃及沪江的时候，刘湛恩开始从“和平主义”转向直接抗日，他和很多爱国人士一样，要求停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御外侮。他不仅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工作，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还作为上海地区代表赴洛阳出席“国难议会”，畅谈救国良策。他一方面邀请力主抗日的冯玉祥以及陶行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校演讲，另一方面在校内外各种讲坛上，疾呼救亡图存，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机会，在欧美各国和南洋各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行径，号召侨胞团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在沪江大学，通过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学校确立了“中国化、学术化和职业化”的目标，步入正轨，声誉日隆。刘湛恩已经成为上海教育界的代表人物，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1932年4月17日，身为北方财阀、媒体大亨的吴鼎昌^⑩来到上海作废止内战讲演。他指出，“对外

长久抵抗，非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各种建设入手不可，但唯一之障碍，为国内战争，苟内战不能废止，一切均无从说起。”^[1]他认为，如果发动全国一致之废止内战运动，“其潜在之势力，实可无敌于天下。”^⑪在上海期间，吴鼎昌与刘湛恩促膝长谈，详细了解了刘湛恩公民教育理念和是非战建设运动的希望，很是感动，答应执笔起草废止非战大联盟章程。此后，在赴南京的江轮中，吴鼎昌就“匆匆执笔起草”了章程。回到天津后，吴鼎昌在南开大学发表讲演时公开肯定刘湛恩《国内非战建设运动释疑》，认为刘湛恩的“解释之言，可谓深切着明”。他强调，如怀疑于运动之有无效力，是本身先缺乏自信力，宁非为好战之军阀张目？抑退百步言，纵令运动不生效力，要亦何害？盖打者虽不必因非战运动而停止，要亦不致因有此运动而加重也^[2]。吴鼎昌还表示，是刘湛恩率发起了非战建设运动。他说，这次到了上海，听了教育界一部分人，正在提倡此事，认为时机成熟——现有许多人认为是财商两界之觉悟举动，事实上是不对的。

4月21日，刘湛恩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国内非战建设运动》，第一次郑重提出了和平非战的理念。这篇文章成为整个非战建设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刘湛恩认为，为确保停止内战，全国各界领袖应订立“国民非战公约”。主要内容有四点：1)订立国内非战建设公约；2)对破坏国内和平和参加内战者采不合作主义；3)奖励建设领袖；4)注意和平建设宣传。

刘湛恩的倡议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书生议政，愿望善良，却过于天真，不可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却不料，在当时的中国，刘湛恩此言一出，包括胡适等学

^⑨ “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上的民主派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呼吁召开会议，要求国民政府改革内政，实行民主，以争取实现他们的主张。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黄炎培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国民党“解除党禁，进行制宪”。在各方压力下，1932年4月7日，国难会议在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下于洛阳召开。会议完全否定了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还表示要实行对日妥协的政策。会议于4月14日结束，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效果。

^⑩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诠，笔名前溪，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华阳。清末秀才，晚清及民国初期官员，金融家，企业家。1926年接办天津《大公报》，任社长，将其办成中国第一流的报纸。后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等职。1949年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病逝。

^⑪ 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hk/history/history_news_content.asp?news_id=134078。

界领袖及林康侯^⑫、徐寄廌、陈立庭、史量才、钱新之等上海金融界名人居然被说动了心,得到一片叫好声和一群应和者。受到鼓励,刘湛恩十分兴奋,一口气又撰写了“废止内战运动之认识与努力”、“国内非战建设运动之代价”^⑬等文章,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非战”和“建设”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5月21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定不久,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决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刘湛恩和金融界人士商议,决定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四团体名义,通电天津、广州、南京、武汉、北平、汉口等地商会、银钱两公会及各界知名人士,正式发起成立废止内战大同盟。5月25日,通电发出,全国各地以及新加坡等地工商团体和社会名流积极响应。吴鼎昌因此感叹,废止内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感”^[3]。

7月26日,刘湛恩与吴鼎昌、张公权等上海各界名流18人一起,联名向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地的社会贤达发出倡议,“希望各界各人共同加入”^[4]。在这份电文中,刘湛恩赫然名列第二,排在吴鼎昌之后。

8月27日,大同盟假上海市商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非战建设运动序幕正式拉开。大会发表通电,宣告废止内战同盟正式成立。他们在通电中说,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目的是“以期安内对外”^⑭,和蒋介石提出的对日妥协、全力“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迥然不同。据大会主席林康侯的报告,共计加入团体501个,个人1057人,遍及全国、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很多华侨。刘湛恩被推选为上海教育系统唯一的“废止内战大同盟常务委员”。

8月29日,废止内战大同盟第一次常委会议在香港路^⑮举行。会议决定,在正式常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未曾通过以前,暂推王晓籁、杜月笙、刘湛恩等五名委员临时办理总会日常事务。

在《废止内战运动文电汇刊》中,多篇电文也都提及刘湛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湛恩的社会影响和在运动中的实际地位。如《华年周刊》^⑯文《国内非战运动的发轫》称,最近上海教育界的领袖刘湛恩先生等发起一个“国内非战建设运动”……并认为该运动一半是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诸国教育界和宗教界领袖发起的“世界和平契合”(Felloeshp of Reconcilintion),并表示,相信“只要

持之以恒,迟早会有收获的”。胡庶华在《促进非战建设运动之管见》一文中开门见山,说,“自刘湛恩博士倡议非战建设运动以来”,海内响应者众。郑亚民在《实行国内非战运动》一文的开篇介绍到,本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⑰载刘湛恩先生《国内非战建设运动》一文。更有曹孚的一篇文章干脆就是读后感:《国内和平方案——读刘湛恩博士〈和平建设运动〉后》。刘湛恩上述四项主张甚至被写进“废止内战运动”的引言。

三、无疾而终:非战建设运动的结局

废止内战大同盟章程共计十条。第二条就如何废止内战,做出了三点具体决议:

(1) 平时本会应发布公开之文字或演说陈述内战之罪恶,阐发和平之功效。

(2)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各界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代替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

(3) 不幸内战发生时,本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

^⑫ 林康侯,名祖晋,字康侯,上海人。1911年,参与创建江苏铁路公司。1914年,进入金融界,任上海新华银行经理。1928年,任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国民党政府财政会议委员、经济委员等职。1929年,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和刘湛恩曾同为工部局学务委员会中的华人委员。193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林康侯加入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投身抗战。上海沦陷后,林康侯赴香港,专门处理海外华侨的抗战汇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林康侯被日军逮捕后附敌。1948年刑满获释,11月即离沪赴香港定居。

^⑬ 1932年,刘湛恩的这些文章发表后和其他领袖的文章一起被编辑成《废止内战运动文电汇刊》,现上海图书馆有藏。《废止内战运动文电汇刊》中的部分文章又被编辑为《废止内战运动》,列为“国难小丛书”的一种,现上海图书馆也有藏。

^⑭ 见《废止内战运动文电汇刊》中《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工会钱业同业工会通电》。

^⑮ 香港路是上海黄浦区东北部的一条东西走向街道,东起圆明园路,西到江西中路,最初修筑于1850年代。186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其更名为香港路。后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达到今天规模。

^⑯ 《华年周刊》,潘光旦主持编辑,1932—1937年在上海发行。

^⑰ 前身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清末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随后又转为研究系的喉舌。1935年报纸产权转让给孔祥熙财团,1937年11月26日迁重庆出版。1945年9月21日在上海复刊。1947年3月21日起改为晚报。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14785期。

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和平适宜方法制止之。

和此前的吕日章一样,吴鼎昌也看到了困难。他认为,我们何尝不知道这不是根本办法,不过病人病到这样虚弱地步,恐怕输血灌盐水的治标救急办法,比根本治疗,还要紧的!被选为废止内战大同盟临时秘书长的严谔声也认为运动决非易事:十年以前,在上海即有裁兵理财制宪委员会之组织。对于此次废止内战之运动,必以求坚强之决心,贯彻其目的,任何牺牲,所不当辞^⑧。

实践中的屡屡碰壁证实了吴鼎昌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当时正好碰上南京政府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发生矛盾,前者欲将后者的海军“划归国有”。削弱自己的势力,陈济棠当然不愿意。同盟一看,实现自己废止内战主张的机会来了,就派了朱庆澜、查良钊、陈正庭三人赴粤调解。不料,陈济棠一见他们三人,就对他们说:“废止内战同盟认为整理海军就是在打内战吗?”这真是难以回答,如果说是,那么无异于承认中央政府在挑起内战;如果说不是,既然不是内战,那么你们来又意欲何为?进退两难,只得铩羽而返。不久,又发生了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事件。蒋介石下令讨伐,同盟积极居中调解,不料惹恼了蒋介石:我这是在讨逆,根本不是什么内战,你们出来调解,是要助逆么?下令同盟自行停止活动。同盟就此无疾而终。

非战运动大同盟在成立声明中说“成立期限为五年,并愿提早解散”。刚成立不久就不了了之,正应了胡庶华的一番话:“大凡内战之起,甲乙两派,

莫不振振有词”,“今日吾国之军阀其野心勃勃,气焰万丈,何异于国际帝国主义,国际非战公约,既不能施之于国际帝国主义,则国内之非战公约,又何能施之于国内之暴戾军阀;而国际帝国主义,既不能受非战公约之裁制,则焉知国内军阀能受非战公约之屈服乎?”

非战运动大同盟的名存实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非战建设运动的失败。受此影响,刘湛恩逐渐意识到“书生爱国”和现实的巨大差距,思想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当日寇侵华野心日盛之际,面对校园内大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刘湛恩很快从主张“读书至上”、“理性爱国”转向积极支持、参与,他不顾生命危险,摒弃利诱,大力宣传团结抗日的重要性,逐渐成为上海抗日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湛恩参与发起的非战建设运动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国民,也启迪、教育了他本人,有助于日后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参考文献:

- [1] 季谦.论非战运动[N].国闻周报,1932-06-06.
- [2]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大会讲谈录要[R]//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上海:上海市民地方协会,1932.
- [3] 吴鼎昌.在废止内战大同盟会上的发言[N].申报,1932-08-28.
- [4] 编辑部.废止内战大同盟成立情况史料一组[J].档案与史学,1999(6):13-16.

^⑧ 《废止内战运动文电汇刊》中严谔声文:《制止内战运动》。